

“纪官庄惨案”的前因后果

2021年4月22日,枣庄市人文自然遗产保护与开发促进会秘书长张运祥、市中区原文化局局长刘健全、枣庄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张凤岭、枣庄晚报记者孙明春等,我们一行六人赴纪官庄镇纪官庄村,采访了八十三年前侵华日军制造的“纪官庄惨案”情况。纪官庄村原党支部书记纪成武、村负责人纪成营、枣庄市宏帝古建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纪启涛等接待了我们。

纪官庄村在枣庄市市中区初期郭镇的西南部,现与相邻的潘官庄村合为一个行政村。抗日战争初期,在这里由侵华日军制造了一起骇人听闻震惊鲁南的“纪官庄惨案”。至今该村的一些老年村民,特别是惨案的亲历者,每当提及此事,还不免心惊肉跳,悲伤不已。

鬼子遇袭

1938年3月19日(农历二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驻扎在郭里集据点的一支巡逻队,约有二十多人,在外出巡逻路经碌水大桥村西时,突然遭到不明身份的抗日武装人员的伏击,鬼子立即就地抵抗还击,一阵激烈枪战之后,两个鬼子被当场打死,一个鬼子受了重伤。伏击人员埋伏在村西野外,借助熟悉的地形,沟壑、丛木和村庄,一会儿工夫不见了踪影。受重伤的鬼子被抬回郭里集据点,当走到到一家酒店村时,这个鬼子就一命呜呼了。

这次伏击是我鲁南抗日游击队所为,当时共有六人,他们是:指导员郑广信、副大队长李文申(苍山县鲁城乡楼子村人),班长王文忠、纪官庄中共地下党员纪允凯和他发展的两名游击队员任思城、陈二金。他们共有三支枪,其中一支枪托断裂,用布条捆扎,还可以射击。这次伏击,我游击队无一人员伤亡,却致三个鬼子毙命,应该是一次成功的伏击。

日军巡逻队遭到伏击后,却不知是何人所为。第二天早上,从枣庄日军大本营调来了二十多名鬼子,到郭里集据点增援。郭里集据点共有四十多名鬼子,出动了二十多鬼子,组成了一支四十多人的小分队,再次从碌水大桥村沿黄楼村进行追袭,鬼子在黄楼村追袭时,有人告密说:昨天有五六个人从这里经过,还有带枪支的,只认识其中一个人姓

纪,这个人就是纪官庄村的。日军小分队得知此消息后,遂将日军分成两支队伍,每队约二十多个人,分别向纪官庄村西方向和村西南方向包抄过去。于是一场报复性的杀戮正在不知不觉的纪官庄老百姓悄悄袭来。

惨案喋血

村民们听说日本鬼子荷枪实弹向纪官庄开来,惊慌不已,年轻力壮的都拖儿带女地跑啦,年老体弱跑不动的就遭殃了。鬼子进村后像红了眼的疯狗,不分男女老少见人就杀,见房屋就放火。

村民纪成营的三曾祖父因为年龄大跑得快,被赶上来的鬼子抓住了,鬼子把老人的上衣扒光,用刺刀大剌膛,当场残忍杀害。村民纪允铎还牵着一头毛驴,被鬼子开枪打死在村南头土地庙旁柿树底下,他自家喂的一条狗却一直守护在主人尸体旁边。几天后,其他遇难村民的尸体都被狗吃得残缺不全,只有纪允铎得以全尸。纪允铎的三弟纪允巨被鬼子开枪打倒在村西南的长汪边上,当时未打中要害,人还没死,鬼子上前就用刺刀穿其喉,之后又挥刀开膛破肚。

北龙头村的徐培忠在枣庄大洼街开中药店,这天恰巧来纪官庄看望姐姐(姐姐是纪学华的奶奶),鬼子进村后,他姐弟俩情急之下钻到了床底下躲藏,鬼子一阵乱窜没发现人,就放火烧了房子,可怜姐弟俩就被活活地烧死在床底下。村民纪玉章的奶奶孙氏被鬼子打死在屋内,又放火烧了屋,后来发现时,尸体已被烧焦。纪玉廷的奶奶被鬼子赶到屋里,再放火烧屋,被活活烧死。村民纪允聪被鬼子打死在村南头村上,纪允耿被打死在村南头坟旁。村北头纪学文的两个曾祖父逃出村向东跑,都被鬼子开枪打死在村东地里,后来就被就地掩埋了。

村民纪允巨之妻、纪允铎之妻、纪允耿之妻徐氏三人被鬼子关在纪玉荣的两间草屋内,外边将门挂上,然后放火烧屋,可怜三位老人都被活活烧死在草屋内。数天后,逃鬼子反的人们返回村时,埋葬三位老人尸体时,都辨认不出死者是谁。后来所幸从老人头上戴的银簪的样式,三家人才得以辨认出各家老人的尸体。

纪允松一家更是凄惨,纪允松和牛角村的付四,既是表兄弟又是仁兄弟都被国民党抓去当兵。他俩听说日本鬼子在纪官庄打死了很多人

人,房屋都烧了,很是挂念家里,就从国民党部队里逃了出来,急忙赶到纪官庄,纪允松还没进村,在村北就被鬼子开枪打死了。家里纪允松的妻子脖子被鬼子用刺刀穿透,六岁的女儿、三岁的儿子都被杀死在家中。付四和纪允松女儿的公婆(家是石灰窑村)听说此事后,第二天两人都带了铁锨到纪官庄准备去埋这几个人。这时,付四带庄增援的鬼子兵又铁锨到纪官庄,将付四抓个正着。付四被鬼子尸体,鬼子把付四前花汪边上,扒光全身衣服大开膛,死得很惨。纪允松女儿的公婆发现还有鬼子兵,撒腿就跑,在距离纪官庄三里路的东南湖,被一鬼子兵发现,远距离开枪射击,给打死啦。

在这场惨案中,全村共有二百八十六间房屋被烧毁,只有一间未烧,就是村东北角麦场上的一栋场屋子,因为与村子连不起来,才未被焚毁。全村共有三十八名无辜百姓被杀害,其中有四人被活活活开膛破肚。仅有一位老进太没有被杀害,她是村民任文头的老母亲。原因是,有几个鬼子进她家院子时,她家院里的一只大花狗拼命地扑咬,老太太在情急之下,把大花狗抱住。鬼子见状说道:“老花姑娘,大大的好!”由于这一平常举动,侥幸地使老太太免于死。

国军复仇

那时,在纪官庄村东两里处的潘官庄,还驻扎着一支国民党的部队,可是国军名义上抗日,但实际上则是不抵抗,暗中保存实力,奉行国民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也是“围剿御侮”的策略。所谓“安内”,就是以“剿共”为中心。因而共产党则选择“反蒋抗日”。所以,日军与国军虽然近在咫尺,却无冲突,相安无事。然而,后来随着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形势的转化,双方的这种选择逐渐演变为国共合作抗日的过程。

日军在纪官庄杀人放火后,向村东北角未烧的那栋场屋集结,并在场屋内暂时休息。这时日军站岗的哨兵,突然发现国军的一个士兵在潘官庄村头,于是日军哨兵向他开枪射击,国军士兵当场被打死。这件事惹怒了国军,国军早已看见日军在纪官庄杀人放火,也观察到日军的人数并不多。于是国军开始了报复,出兵包围了纪官庄打麦场。经过



村负责人纪成营领着“纪官庄惨案”遇难者纪念馆

一番激烈枪战,由于日军武器精良,国军伤亡很大。但是,终因日军寡不敌众,最后退守场屋内负隅顽抗,麦场上有几座麦草垛和秸杆堆,国军士兵抱来秸杆麦草垛上,放火焚烧,火借风势,借风放火很快吞噬了整个场屋。仅有一个鬼子兵冒死从大火中逃出,还被国军击毙,其余的鬼子全部都被活活烧死在场屋内。正可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这些两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恶魔,最终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场恶战虽然使日军四十多人全军覆没,但是国军也死伤了一百多号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惨案的当天傍晚,潘官庄有位姓朱的老汉,在南湖地里面看庄稼,无意中撞着了国军的电话线,但是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线,拉拉扯扯挺结实,就割了一大段想回家打苦子作经绳用。在潘官庄驻扎的国军发现电话不通了,以为是枣庄日军又增援过来了部队,要对国军进行报复,掐断电话线是以防国军求援。于是国军不敢久留,就连夜拔营启程,撤到台儿庄去啦。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惨案的亲历者也渐渐逝去,知情者已寥若晨星。不忘初心使命的纪官庄人,已步入了历史发展的新时代。为了纪念在这场惨案中遇难的村民,他们在村子中央建有五角星纪念馆一处,成为村民追忆纪念惨案遇难者和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纪念馆标志。

(本版图文皆为刘圣明提供)

1938年3月24日(即农历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多钟,侵华日军矶谷师团步兵第六十三联队,有步兵一千余人,配合三十二辆坦克车,骤然向郭里集进犯。村头上的人们远远看到前面有长长的坦克车队开道,后面跟着排成四路的鬼子兵,尘土飞扬,声响嘈杂,呼啸而来。村民们惊慌失措,奔走相告,四处逃窜。多数村民逃进了北山里避难,一些老年人和行动不便的村民侥幸留下来看家。日军杀人放火,抢劫财物,侮辱妇女,制造了一起惨不忍睹的“郭里集惨案”,对枣庄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

历史上的郭里集分布在“丁”字路口周围,自然形成三片,即南北路路东称东街,路西称西街,北端东西路路北叫后楼,在“西”字东面后楼改名为民主村。日军开进郭里集后,住进西街外名叫“六壶头”的任姓大地主家里。他家房子多且房子好。三十二辆坦克车都停放在民主村大汪北沿的打麦场上,距地主大院约有五六百米远。日军在麦场两端安了两个哨兵站岗。

日军在包围郭里集二十集团军一部发生激烈战斗,并将其击退。有一个日军士兵在前古屯大汪崖被我游击队击毙后,日军就像红了眼似的,开始对郭里集一带村庄进行报复。据《枣庄市志·大事记》记载:“1938年3月24日:日军矶谷部队在郭里集一带六个村庄内进行奸淫烧杀,烧毁房子不计其数,杀害百姓五六百人。”

日军驻扎在郭里集,给当地百姓带来了灭顶之灾。日军将一些老年人或因行动迟缓未能来得及逃离的村民赶出家门,押进了西街一家造酒作坊的磨房囚禁。当时被押进来的村民共有十三人,其中有张姓一家四口,即夫妻俩和他们两个男孩。鬼子见张家媳妇年轻较有姿色,顿时起了淫荡之心,遂欣喜若狂,嘴里哇哇地叫喊着“花姑娘的干活”,意欲发泄兽欲。但是该鬼子急于去开会,暂时未能得逞。乡亲们趁机会将张家媳妇赶快找地方躲藏起来。在乡亲们的督促帮助下,张家媳妇急忙跑上磨房,翻过不高的院墙迅速脱身藏匿。

当那个鬼子再回到造酒作坊时,发现年轻妇女不见了,于是在作坊院内各屋寻找了一通,没有找到,又气急败坏地回到磨房。鬼子端起刺刀对着一个村民发问,该

村民听不懂日语,只是摇头。鬼子兵就大声呵斥,该村民还是摇头。鬼子兵恼羞成怒,将刺刀猛地扎向该村民的耳门,然后用力一拧抽出刺刀,顿时鲜血喷射,脑浆并流,身体轰然倒地,顷刻丧命,其惨状目不忍睹。在场的人们,有的用手捂住眼睛,有的将脸转向一边;小男孩被这突如其来的血腥杀戮吓得嚎啕大哭,鬼子的父亲急忙将孩子的头捂到怀里。

鬼子的父亲这种杀人手段叫做“扼喉”,是一种比较狠毒残忍的杀人手法,只有兽性十足,杀人如麻的恶魔歹徒才会运用自如。尽管如此,鬼子兵并不肯就此罢休,又将刺刀逼向下一个村民,还是大声喝问。该村民默不作声,怒目以对。双方对峙僵持了片刻,杀人不见眼的鬼子兵将双手托着的刺刀猛然一送,刺刀深深地扎进了村民的耳门,待日本兵用力一拧抽出刺刀时,被刺村民应声倒地,血流如注,戛然而命,其凶残的杀人手法同前如出一辙。

鬼子兵像一只疯狂的吃人野狼,面对眼前一群手无寸铁、无力抗争的老人和孩子大开杀戒。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怜的村民只能任人宰割。一个,两个,三个,四个……,十位羸弱的老年村民连同两个孩子就这样被鬼子兵施以“耳戮”残杀致死,无一幸免。磨房内顿时死者相枕,血流成河,其惨状目不忍睹。在此遇难的村民中,有姓张的爷仨,还有亲兄弟俩的。据知情人士讲:侥幸逃脱的张家媳妇因丈夫和两个孩子都被日军杀害,婆家没人啦,也就只身回了娘家,娘家是峄城区左庄乡某村。她终身未再改嫁,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去世,享年八十多岁。

据民主村九十一岁的王培增老人回忆说:惨案发生时,我才八岁,当时我跟着大人逃日本反,跑到北山里老牛口一带(今属山亭区山亭镇),那里也没有俺家的亲戚朋友,一家人住在村头林林圈内,饿得向当庄好心人要两个干煎饼充饥。我们在那里过了个把月,在农历三月底才敢回来。回家后,有一天我跟着本村的小伙子李凤同

郭里集惨案

(后来去了台湾)到西街造酒作坊。李凤同十岁,比我大两岁。我进了作坊



当年的造酒作坊,即惨案发生地遗址。

的磨房,看见西墙上有一个血脚印子。磨房的血都静住啦,足足有四指厚,两个磨盘上都是干涸的血迹。看来这里就是发生惨案的现场。

惨案实况 血腥残忍

第二天,即5月16日,驻枣日军奥保夫部队出动百余人,乘军车杀气腾腾地赶到三个龙头,实施疯狂报复。听说鬼子来了,老百姓四处逃窜,逃得早的投入了十里八乡的亲戚,逃得晚的只好藏身野外的庄稼地里。有些老年人行动不便,也依仗着年纪大,鬼子不会怎么着,就侥幸留在家里的家。

鬼子进村后,如同恶魔,见人就开枪,见房就放火。那时村里都是草房,鬼子将成捆的干柴粘点着火塞在房檐下,大火一烧了上去。村里多处起火,浓烟四起,火借风势,迅速蔓延。不会功夫,三村变成了火海。

东龙头村民王锡老老人听说鬼子进村了,未来得及逃脱,在情急之下钻进了院内的草垛中躲藏,鬼子放火后,就被活活地烧死在草垛中。几天后,逃难的家人回村,找不到老人,后来才在草垛中发现了老人的尸体,已被烧得面目全非,缩成一团,无法辨认。村民王培增带着辘轳(井上提水的农具)浇菜园回家,被日军迎面用刺刀刺死在自家的大门口。

王银增、王现增是亲兄弟俩,分别藏在村北的麦田里,被日军发现后刺刀刺死死于非命。

村民宋汝洋家富裕,穿的衣服较好,不像是干庄稼地的农民,手上也没有茧子,鬼子怀疑他是八路,被抓去。经过拷打审问,宋汝洋拒不承认是八路,说家就住在龙头村。后来,鬼子又带他到龙头村让人们辨认。由于他已被折磨得面目全非,在龙头头,北龙头人们也认不出他了。于是鬼子就用绳子把他拴在马鞍上拖拽,将整个身子拖散了架,最后在龙头村只找到了一条腿,因为他穿的鞋是从外地买的,鞋面上有三道杠,家人这才认出是他的腿。

另外,有两个村民被日军远距离开枪打伤,一个是田毓昌,被日军击中大腿肚子,另一个是王培立,被日军击中了胳膊,被击中者随即倒地而死,逃过一劫。

听我父亲讲,发生“龙头惨案”那年他才十八岁,住在北斗庙内,听说日本人来了,他与我奶奶俩逃到沧浪湖避难,事后回家时麦糠里的火还烘烘的。北斗庙共十五间房子,烧了十三间,大殿西头两间房顶没了草,鬼子没有点着。

东龙头村东岭上的九龙庙,在这场劫难中未能幸免,只剩下烧塌的屋檐高文庙前的石碑。

北龙头村民崔文玉老人被日军刺死在着火的草屋中,事后被村民悄悄地将尸体扒出,埋理在他自家院内。孙宝德老人被日军杀死后又推到了着火的草屋里焚尸。

村民孔庆恩被鬼子用刺刀刺死后,又碎尸若干块,并扔到

惨案当天,鬼子在大街上横冲直闯,见人就杀。东街有个叫王庆的青年,因为生病卧床未能逃离,被日军拉出家门,用黑布包了头,绑在树上开膛破肚,挖出了心肝;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大,日军也不放过,将其轮奸后杀害在村头的大树下;一位王大娘见鬼子进家,急忙退到锅屋内躲藏,被鬼子刺死在台灶旁;还有一位老大娘也是藏在黑暗的锅屋里,鬼子进屋后用刺刀向黑暗处乱戳,鬼子惨叫。

西街社主任任振田拿了一根木棍想和鬼子拼命,刚出大门,迎面遇见几个鬼子进家,因寡不敌众,被鬼子当场杀死。他的妻子孙氏在九十岁时,一提起此事还泣不成声;村民张广晋、瞎瞎子两位都是盲人,鬼子也未放过他们,亦被杀死。

东街村民王茂朴的妻子,被几个鬼子追赶欲行不轨,她抗拒逃跑,兽兵们紧追不舍。她跑到菜园里投奔身亡,鬼子追上前去,又向并得打了几枪;东街北头一位姓赵的老大娘,六十多岁,被丧尽天良的鬼子兽兵侮辱后,又扒衣服吊死在树上,还扯开她的裹脚带,看中国妇女的小脚。

鬼子兵挨门逐户寻找“花姑娘”,村里未来得及逃走的妇女,自知不能幸免,有的跳井,有的上吊,自寻短见,以保清白之身。据民主村九十二岁的李玉坤老人回忆说:日本人在郭里集杀人不少,自知不能幸免,有的跳井,有的上吊,自寻短见,以保清白之身。

日本人在郭里集杀人不少,自知不能幸免,有的跳井,有的上吊,自寻短见,以保清白之身。据民主村九十二岁的李玉坤老人回忆说:日本人在郭里集杀人不少,自知不能幸免,有的跳井,有的上吊,自寻短见,以保清白之身。

南龙头村后菜园的水井里,最后一块尸体搭在井上的辘轳架上,鲜血淋漓,惨状目不忍睹。

村民靳广密、吴清桃、杜科科三人在村东田地里被追跪在地上,被鬼子砍了头。杜科和李四元都是被鬼子用刺刀刺死而死。

村民潘景玉和十五六岁的杜某被日军抓去做苦力,他俩就没那么幸运啦,至此杳无音信,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南龙头村民吴清兰,刚结婚不久,其妻怀孕,因放心不下妻子,未能外逃,却被日军砍首,脖颈上仅连着一层皮。

村民颜文斌也是被日军砍头致死。村民赵二,赵某某都是被日军开枪打死的。

如此种种,日军暴行,杀人放火,涂炭生灵,草菅人命,难以尽述。

在这场惨案中,三村罹难的无辜村民共计二十二,兽兵还奸淫妇女若干人,烧毁房屋千余间,粮食一焚皆无,使三个龙头村鸡犬不存,尸体横陈。往日村民生活的安居祥和之地,顿时变成了一片废墟。

时间已过去了八十多年,惨案的见证人也一个个相继离去,这一历史真相,将被知情者带到另一个世界。如此而已,“龙头惨案”这一触目惊心的历史事实,将会被流年月所淹没。清代著名学者袁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知史而后兴”。2014年5月,最具社会责任感的龙头人,自发于民间捐资二十余万元,在东湖文苑修建起“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馆,以达到“不忘前事,激励后人”之目的。2015年12

名老百姓。此处是两河交汇处,河水较深,当地俗称“老淹头”。日军在“老淹头”河南崖井台上设了个岗哨,河对岸是一条沿河小路,鬼子岗哨看见老百姓走路开枪就打。据王培增老人回忆说:在“老淹头”被打死的村民我知道的就有:燕德贵的华现,有北七里曹青梁的三二的大儿叫大欢,有王玉香的外姥爷姓宋。我从北山里逃回来,那天我牵着牲口跟高均忠的多高炳元和他姥爷尚松喜到湖里耕地,走在庄北路上,看见那七具被打死的村民尸体还在那里躺着,第二天俺爷四个耕地回来,再看那尸体就吐狗屎的不成样子啦,当时狗很多,人们都逃反跑啦,狗没人喂就吃死尸。只有王玉香的外姥爷姓宋老头熬白胡子,尸体还好好好,狗没吃,不知是什么原因。宋老头家里没人啦,村民高炳元到了峨山口给他家说了,他本家来人顺着河湾过来,就将老人埋上,他连一顶席也没占上,如今那个坟子还在“老淹头”那里。

这场惨案是惨痛的,在当地也是史无前例的。《旧唐书·李密传》云:“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未尽。”用此来形容罪行多得不尽。日军在郭里集所作所为,血腥屠杀百姓又何曾不是呢!惨案中郭里集一片火海,东街、西街,民主村共烧毁房屋六百多间。杀人放火抢东西,面对手无寸铁的老人和孩子,日军也能下得了手,真是禽兽不如,无人性可言。

时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这些屈辱的历史、痛心的事实,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要忘记。只有铭记历史,勿忘国耻,才能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这是习近平主席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讲过的话,至今仍萦绕在耳,引人深思。历史是一面镜子,铭记历史,以史为鉴,明确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激励人们迎难而上,锐意进取,努力拼搏,发愤图强,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本版文为刘圣明, 图为王淑华提供)

月,“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落成,市、区、街道有关领导亲临现场揭牌祝贺。“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的落成,成为枣庄市市中区东湖沿河岸首个重要人文景观。2016年5月,市中区关工委将此命名为“市中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9年12月,枣庄市关工委将此命名为“枣庄市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

“龙头惨案”是个悲哀,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修建“龙头惨案死难者纪念碑”,哀悼遇难者,表达对逝去的生命的尊重和对历史的责任心,是对死难者在天之灵的慰藉,也是对日本侵略军的血泪控诉,更是对我们子孙后代的启迪和警醒。我们世世代代要永远牢记这一屈辱的历史,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并不是要种下仇恨,撒仇恨,延续仇恨,而是要牢记住历史的侵略战争与悲剧,保持对历史的阵痛感。更重要的是,从祸患和阵痛感中警醒,吸取历史教训,倍加珍惜和重视和平。我们利用这块基地,多次对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使之勿忘历史,明确落后就要挨打的事实。激励人们,以史为鉴,珍惜和平;努力拼搏,圆梦中华;坚持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永葆江山固若金汤,使历史的悲剧永不重演。愿人类和睦相处,和平共存。这也表明龙头人牢记历史,不忘初心,热爱祖国,捍卫祖国的决心和愿望。

注释: ①李春和同志,枣庄市市中区老枣庄街人,回族,1919年出生。193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地方党组织抗日救国思想宣传的影响下,参加了枣庄战区服务队。先后在四县边联、山东分局统战部从事战时工作。1939年,护送郭子化同志(中共七大代表)去延安。1947年,调到东北,先后担任黑龙江省甘南县四区区长、区委书记。

1949年,全国解放后,先后任黑龙江省开通县委副书记,省政府监委财政室主任、省机械厂长。1953年调到北京,任国家第一机械工业部二局生产处副处长。

1958年,调到宁夏工作,先后任宁夏机械局副局长,重工业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工业厅副厅长、宁夏国防科工委党组书记、主任等职。

李春和同志的夫人夏似平同志,系江苏无锡人,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主席。

李春和同志于1984年9月,在宁夏离职休养。1991年3月21日,因病在银川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本版图文皆为刘圣明提供)

龙头惨案始末